

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

◇ 薛瑞泽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河文化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特点、内涵等方面都有不少论述。也有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抓住了黄河文化延续不断的内在动力^①。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虽然已有表述,但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鉴于此,在诸位贤达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再做探讨,以求得学术教益。

一、把握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精髓

众所周知,精神特质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并不能全部以物化的载体来体现,所展示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正因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所以研究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应当将黄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序列中加以考察。只有弄清楚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才能对黄河文明的精神特质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关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认识,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习近平总书记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观升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特质,对于新时代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运用到提升民族品格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故而有学者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做了进一步总结:“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核心和灵魂;“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基石;“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精髓。上述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论大厦。但是,这三个方面代表了精神特质的不同内涵,不能相互取代^[2]。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精到总结,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内涵、提升中华文明的品级、扩大中华文明影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根文化的黄河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文明的根源就需要从黄河文化开始追溯探源。

从中华文明中“讲仁爱”的传统来看,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先贤就提出这一理念。对于君子来讲,仁爱是处世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周易·乾传》有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3]卷1《乾传》,22}即君子应当本着仁爱的精神将平生所学用于社会实践。对于圣人来讲,仁爱是维护崇高地位的必胜法宝。《周易·系辞下》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孔颖达《疏》云:“圣人何以保守其位,必须仁爱,故言‘曰仁’也。”^{[3]卷8《系辞下》,297}用仁爱对待百姓可以保持圣人的地位。对于普通人来讲,仁爱是修身养性的日常修为。《周易·说卦》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卷9《说卦》,326}的说法,即立身之

① 陈鹏认为,黄河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磅礴雄伟、忧患悲壮、崇德尚品、融合包容、强大生命力等精神特质(《黄河文化的多重精神特质及符号构建》,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5期)。刘金指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表征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高尚品格,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中华文化海纳百川、融合包容的宝贵品性(《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时代价值》,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年第30期)。

道在仁愛與正義。在《論語·顏淵》中，孔子對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等學生關於“仁”的詢問做了全方位的解釋，有“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4]卷12《顏淵》，157，亦有“愛人”的解釋。在《子路》篇中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4]卷13《子路》，178的進一步闡釋。在《憲問》中，孔子還歸納了實現仁的途徑，“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孔子申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4]卷14《憲問》，182此外，在《孟子》《左傳》等相關篇中都有關於仁的闡釋，顯示了先秦儒家對仁的認識。

“仁愛”作為整詞出現在戰國時期，《墨子·經上》云：“仁：仁愛也。”《文子·道德》也曾說：“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5]可見，仁愛之心是免除災禍的必然修為。晏子贊美自己的國君齊景公“吾君仁愛”，使“禽獸之加焉”，這一仁愛惠及百姓，“此聖王之道也”^[6]。到了漢代，對於仁愛的解釋更體現出時人的政治洞察力。《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7]卷19《修務訓》，1312《本經訓》有“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7]卷8《本經訓》，599之語。《淮南子》通過對先賢行仁愛之政的贊美，寄希望於漢代統治者也實行仁愛政治。漢代在以孝治天下的文化背景下，重視並尊重老人，所以漢代有人分析了缺乏仁愛現象的原因。戴德指出：“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8]他甚至提出了“人君自仁愛而天仁愛之”，強調人君仁愛的重要性。戴德強調不孝是因為不仁愛，不仁愛是因為喪禮不明，故而得出喪禮符合規定，仁愛就會產生孝，延伸了仁愛的社會觀念。袁盎在任隴西都尉時，“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9]卷101《袁盎晁錯列傳》，2741。司馬遷評價李廣將軍率軍北征匈奴時，“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9]卷130《太史公自序》，3316。這說明儒家的仁愛思想在漢代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到了後世，儒家的仁愛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多有體現。

“重民本”是自古以來統治階級維護和鞏固統治的一種統治觀。“重民本”思想體現了統治者關注民生、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關於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時期已經產生，先秦諸子對民本思想多有論述。《孟

子·盡心下》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漢代趙岐注云：“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10]孟子對民、社稷、君位次的排列，顯示了民眾作為社會基礎的重要性，也是國家存在、君主得以行政的根本所在。康有為把“民為貴”解釋為：“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王；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周自幽、厲後，威靈不能及天下，已失天子之義。”^[11]康有為將重視與輕視民本的结果做了深刻闡釋。《荀子·哀公》載，孔子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12]卷20《哀公篇》，544以君為舟、民為水加以比喻，成為後世統治者民本思想的重要內容。商鞅變法時，則將民眾放到統治者的對立地位，強調“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故而“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13]。這其實是商鞅以法治國思想的體現，將君主的利益建立在民眾的利益之上。正因為如此，漢代以後對秦代的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予以拋棄。重視百姓生活、關注民生是歷代賢明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最高追求，也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模式。

“守誠信”作為與人相處的最基本原則，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基本準則。誠信一詞出自《孟子·萬章上》，孟子稱頌舜“誠信”。《禮記·祭統》曰：“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14]卷29《祭統》，1346這表明賢德之人以誠信與忠誠恭敬之心來祭祀。司馬遷對李廣所遭受的冤屈頗有同感，給予李廣高度評價，他先是引用《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予以褒揚，在李廣自殺身亡後，面對“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的現象，司馬遷稱頌“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9]卷109《李將軍列傳》，878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因為博望侯張騫在西域的影響，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集解》引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9]卷123《大宛列傳》，3169這說明在對外交往中誠信的重要性。司馬遷說到樂的重要性時有“著誠去偽，禮之經也”之說，《正義》云：“著明誠信，違去

诈伪,是礼之常行也。”^[9]卷24《乐书》,1202 从先秦到汉代,诚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说明守诚信已经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

“崇正义”即崇尚正义。在古汉语中“义”即代表正义,讲究“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如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义’是中华民族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道德准则。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延续发展中,公平、正义在思想与道德层面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5]这些在先秦以来的儒家典籍中多有体现。《周易·系辞下》云:“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3]卷8《系辞下》,297《说卦》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卷9《说卦》,329。《周易》将仁义看作立身之道。《尚书·毕命》记载周康王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16]卷19《毕命》,525《左传·隐公元年》中郑庄公说其弟共叔段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17]卷2《隐公元年》,53《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17]卷5《桓公二年》,152 他将正义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命名用来表示道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用来体现政治,政事用来属正百姓,所以政事有成效而百姓服从。汉武帝时期,窦太后在诏书中有云:“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9]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2963 可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先秦两汉以来已经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影响。

“尚和合”即崇尚和合的处世理念,这既可以上升到国家之间的层面,也可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西周末年,郑桓公对先秦诸王朝的开国君主进行了赞美,其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18]。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春秋时期,孙叔敖被举荐为楚相,“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9]卷119《循吏·孙叔敖传》,3099。他用和合的理念治理国家,实现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战国时期,魏文侯礼贤下士,“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所以当秦国欲伐魏国时,有人劝谏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9]卷44《魏世家》,1839 可以说,魏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荀

子·礼论》在谈到和合的重要性时指出:“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憊谗而有所至矣。”^[12]376 可见,“和合”是无所不往、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合之道与畜道、养德有密切关系。《管子·幼官图》云:“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19]在《兵法》篇中再次强调了和合之道的重要性。汉武帝死后,燕王刘旦谋反,理当处死,“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9]卷60《三王世家》,2119。这是大臣出于和睦家人而希望汉昭帝网开一面。司马迁还给出了和合的方法,即“乐统同”,《正义》说:“解情不变也。统,领也。同,和合之情者也。”^[9]卷24《乐书》,1202 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被征贤良文学,在答对汉武帝时云:“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20]卷58《公孙弘传》,2616 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在策免师丹时说:“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20]卷86《师丹传》,3507 可见在时人的心中,三公有辅佐皇帝和合天下之责。从先秦两汉和合观念的普及状况来看,和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统治者追求政治稳定的治国理念。

“求大同”即追求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政治理想,这是古代思想家的理想世界。《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4]卷21《礼运》,658-659 正因为大同是国泰民安的象征,故而成为理想化的国度,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综观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内涵可以看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内涵的认识有助于全方位认识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以便全面考察黄河文化精神特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久远性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

也是黃河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文化區。黃河文化精神特質的形成與發展,與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相伴而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核心所在。探討黃河文化的精神特質的表現,需要對黃河文化特質的形成過程加以考察,才能明白其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地位。

黃河文化以其歷史久遠性而引起人們的關注。從世界文明的整體發展來看,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作為東亞地區最先进入文明門檻的地區,除了黃河中下游地區有眾多考古發現外,尚有紅山文化遺址、良渚古城遺址。紅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分布範圍在東西北部的熱河地區,北起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南至河北北部,東達遼寧西部,遼河流域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境內有分布較為密集的紅山文化遺址,被認為是紅山文化時期社會上層統治者居住的核心區域,見證了紅山文化孕育、形成、發展和演變的全過程。據研究,紅山文化成為後來形成的商族、肅慎、東胡、濊貊等東北各民族、部落共同的文明起源。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文化,距今5300~4000年,中心地區為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千米,出土玉器最為有名。有人認為良渚文化屬於虞舜時代,屬於夏文化的源頭。學術界對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研究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明起源的歷史遺存更加豐富且延續不斷。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發現了石砌城牆以及城門、墩台、角樓、“馬面”等附屬建築。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構成,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系國內已知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時期城址。外城東門址包含內外兩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門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畫、石雕和陶器等龍山晚期至夏代遺物。石峁遺址對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有重要意義^[21]。

在河洛地區所發現的雙槐樹遺址、陶寺遺址等一系列城址,表明河洛文化是黃河文化系列中最先进入文明時代的區域文化。河南巩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是新發現的早期城址,遺址現存東西長

約1500米、南北寬約780米,面積約117萬平方米。遺跡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道環壕,院落式夯土基址,大型夯土建築群基址,瓮城結構圍牆,大型版築遺跡,夯土祭壇,四處經過規劃的墓地共1700余座墓葬,另有數量眾多的房址、灰坑、窑址及骨器坑,遺物有陶器、石器和骨牙器等。雙槐樹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它與周邊分布的眾多遺址共同構成規模巨大的聚落遺址群。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鄭洛地區聚落遺址群的發現,為中華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為探討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奠定了基礎^[22]。

在黃河中游地區,以夏代都城建設為例可以看出黃河文化的久遠性特質。夏代都城在早期並不固定,而是頻繁遷都,甚至出現了一個國君有多個都城的现象,顯現出早期中國社會發展的多样性。舜去世後,禹即位之初,定都陽城,故有“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之說。《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9]卷2《夏本紀》,82}這說明大禹即位之初的都城為陽城,陽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9]卷28《封禪書》,1371}《集解》引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9]卷4《周本紀》,129}從夏禹初期建都的地点可以看出有陽城、陽翟、平陽、安邑、晉陽等地。這些地点都在河洛地區的范围之內,屬於豫西晉南等黃河中游地區。

以禹都陽城而論,除了史書記載之外,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即大城)和城壕的發現,引起學術界高度關注和重視,被認為禹都陽城之所在。陽城發現了城垣、城壕,是城池的典型標志。夏禹定都陽翟在古書中多有記載,《帝王世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9]卷2《夏本紀》,49}陽翟在陽城東南,是夏禹繼陽城之後的另外一座都城。《水經注·潁水注》云:“潁水自潁東迤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23]陽翟還有夏啟宴享諸侯的附屬設施鈞台。《左傳·昭公四年》云:“夏啟有鈞台之享。”杜預注:“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台陂,蓋啟享諸侯於此。”^{[17]卷5《昭公四年》,1200}禹

都安邑、平阳或晋阳没有发现考古遗存,但文献中尧、舜、禹相继在河东地区建都的传统,相沿不断。如果说尧都平阳是陶寺遗址,那么禹都平阳应当距此不远,孔颖达曾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16]卷7《五子之歌》,179张守节指出,周成王分封的唐叔虞的地理位置“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9]卷39《晋世家》,1635,即唐代的“晋州平阳县”,故而禹在河东地区的都城安邑或平阳也应当是一处地方。近年来,夏都斟鄩问题作为学术热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传统史书记载夏启之后,太康即位,都城由阳翟迁到斟鄩。太康在位时由于沉湎于酒,导致失国,政权被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所夺取,故有“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之说。羿继续以斟鄩为都,到了夏代最后一位国君夏桀也以斟鄩为都,所以《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9]卷2《夏本纪》,86夏代掀起了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帷幕,进入夏代之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最初的城市。这些从龙山文化传承下来的都城,表现出点状分布、区域多样的特色。从传统史书记载,到相关都城遗址的不断被发现、认定,夏代早期都城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一带,并最终在斟鄩安定下来。

黄河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特质具有历史久远性,早期城市的形成过程,显示出黄河文化特质具有悠久的历史。黄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与理念均是在先秦时期萌生,并被后世继承的治国理政思想,显示出这一文化具有久远性的特色。

三、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影响

正如学术界所论述的那样,黄河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磅礴雄伟、忧患悲壮、崇德尚品、融合包容、强大生命力等精神特质^[24]。这些典型的文化特质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影响力。

首先,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在面临危难时刻往往能够共赴国难,众志成城度过艰难岁月,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外敌入侵的时

候,黄河儿女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自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在14年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入侵,黄河儿女采取多种方式反抗日寇的暴行,这里产生了闻名遐迩的地道战与地雷战,也留下了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坚强不屈精神,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

其次,黄河文化包容性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包容多种文化,吸纳各种文化的长处,使黄河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笔者曾经专文论述黄河文化的多源性:“黄河文化丰富内涵的形成与来源多渠道的文化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多源性特色。农耕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要支撑点,体现出黄河文化形成的根源是农耕文化。黄河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来自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影响,这是黄河文化丰富内涵的又一来源因素。黄河文化对来自域外的文化广泛吸收,形成了黄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色。”^[25]除了传统的文化吸收及来源的多源性特色外,对来自域外文化的吸收,彰显了黄河文化融合包容的宝贵品性,使黄河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这在中国近代以来黄河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得以完整地体现。

再次,黄河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使中华民族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凭借民族自觉性,奋发图强而拓展民族发展的空间,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黄河文化面临多次危机,但都能够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自强不息优秀品格而使文化得以延续不断。黄河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来自草原文化的渗透,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如果黄河文化不对这一异质的文化采取排斥、接受、吸收、融合等文化发展进程,黄河文化就难以延续至今。特别是在秦汉之际、十六国时期、北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入黄河流域,如果没有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强大支撑,这些来自草原地区的文化极有可能毁灭黄河文化。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黄河文化在草原文化进入之后,以其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容纳了这一异质文化,同时使黄河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最后,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综合了中华文明精神

特质的内涵,所以黄河文化精神特质能够产生持续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在黄河文化方面深入渗透的结果。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现代社会的体现是全方位的。讲仁爱与重民本是作为社会管理阶层应当关注的内容,还要体现在日常行政方面。守诚信与崇正义是人们日常交往与修养的基本品格,并因此深入到了民族灵魂的深处,成为社会的价值观念。尚和合与求大同是处世的最基本原则,由此形成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平等的公平世界。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01).
- [2]邹绍清.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7):35-43.
- [3]王弼,等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文子.文子校释:卷5[M].李定生,徐慧君,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3.
- [6]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五):内篇杂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3.
- [7]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8]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8):盛德[M].北京:中华书局,2008:828.
-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14上):尽心章句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8.
- [1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8):孔子为制法之王考[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 [12]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201.
- [13]高亨.商君书译注:画策[M].北京:中华书局,1974:376.
- [1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5]丛云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31.
- [16]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8]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2:466.
- [19]姜涛.管子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70.
- [2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考古,2013(7):15-24.
- [2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21(7):27-48.
- [23]郦道元.水经注(卷22):颍水注[M].陈桥驿,注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336.
- [24]陈鹏.黄河文化的多重精神特质及符号构建[J].人民论坛,2020(25):135-137.
- [25]薛瑞泽.黄河文化的多源性与中原文化历史地位确立[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2(6):7-13.

作者简介: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